

于右任函札残篇考释

——兼论陕西靖国军失败之主因

刘东社

(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1919年3月24日于右任致某人函提及历史人物17个, 涉及郭、樊两部易帜受编、许兰洲谋陕、于氏拒绝与北廷“合作”、王珏与郭英甫坚守乾县、张瑞玠入陕划界等重要史实, 故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经对于函及其它史料的剖析可知, 陕西靖国军血战经年, “倒陈”始终既是其手段, 更是其目的。靖国军之所以不败于疆场而败于密室, 终至冰消瓦解, 其主因即在于借护法之名以兴, 以法不足护及无护法之实而亡。

关键词: 于右任; 陕西靖国军; “联许倒陈”; 护法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5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98X(2008)02-0084-07

20世纪60年代初,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征集到于右任给某人的一封信残篇, 并将此信全文及原件影印刊发于《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12月内部发行)上。以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陕西靖国军》一书, 也以《于右任给某人的书札》为题, 收录了此残札文字。^{[1] 359}可迄今为止, 40余年来, 尚未见有人对此函进行考释剖析, 致此一史料长期不为人所重视, 诚为憾事。笔者草撰本文, 拟通过考释此函并利用于右任的相关书信及其它史料, 对陕西靖国军失败之主因, 作一番新的探讨。

—

于右任给某人书札的残篇, 保存于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此函残篇以行书直行书写, 原无标点, 共计330个字。另在首、次两行“阎纶如”三字右侧行间, 有“警吾知之”四字, 公布者未加刊出, 亦未作说明。若加上它们, 全文当为334个字。

笔者以现已公布的文字与手迹影印件相比勘, 更正了个别明显的文字不确及标点符号使用不当之处。校勘后的全文如下:

郭、樊事今已了然。昨日阎纶如、马凌父、田华堂、党晴飏、暴质夫为我来信(由兴、岐), 谓许之为人如何好, 如何好。伊等现抱定“扶许倒陈刘”主义, 极力做去。许对伊言, 愿担任督军, 请不才作省长, 伯英军务会办云云。这些人处交通不便之地, 日在瓮中说话, 被人活埋还不自知。许某乘火打劫, 欲仗军党之力, 来陕觅地盘。我军苦战连年, 为张作霖开一殖民地, 使陕民痛苦不能减轻, 如何而可? 我岂自私自利者哉!

昨将乾县告急书寄龙门。乾县今日又来人告急, 说危急到十二分了。

陕战未停情形, 已函衡玉, 伊接函后淡然。柏仁请伊电海上, 伊说这种事电去, 和会岂不破了, 遂草草入省。昨衡玉由省以通话通知此间, 教修理电杆(电报前已修好, 近数日又被其弄坏)。但陈军近又在咸阳方面, 将线移作得律风之用, 故意与我军为难。未知一两日内能通否?

小儿女辈读书事, 要认真, 要注意。弟要与我时时写信。

右任 三月廿四号

收稿日期: 2008-04-23

作者简介: 刘东社(1964-), 男, 陕西兴平人, 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副教授。

二

于氏残函虽不长，却涉及到陕西靖国军史事的很多侧面，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唯私人书信行文简省，若不加考订解释，某些关节处则不易准确把握。下面就函中涉及之时、地、人、事诸方面略予考校。但须说明的是，因笔者掌握的史料及个人见识有限，个别地方目前尚难下断语；或有考订不周甚至错讹之处，亦恳请识者教正。另，此节考释仅限时、地、人三方面，史事详于下节。

1、时间。此函落款处有“三月廿四号”字样，以相关史事验证，可知为公历月日。函无年份，然相信稍知陕西靖国军历史的人，都不难依据文字内容脱口说出年份，即1919年，此点无需多赘。即于右任此信写于1919年3月24日。

2、地点。以时日为依据，同样容易得出结论，该信当写于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三原县城。信中提及的乾县、咸阳，人所俱知；括号内注明的“由兴、岐”，分指当时的兴平县、岐山县；“电海上”即致电上海，更具体指南北两政府间在上海举行的议和会议。“入省”、“由省”的省，按当时陕西人的称呼习惯，指省城西安。

3、收信人。因该函前半部分散失不全，收信方已无从考核。但是，于右任在信中称对方为“弟”，要求他时时给自己写信，又告诫对儿女辈读书之事“要认真，要注意”，末尾还特意加上“龙门诸公均好，伯麟亦好”一句，从这些话语推测，收信人当是与于右任关系相当亲近而年龄和于氏相差较大的平辈人物。同样，这显然也不是写给上海和会南方代表告知陕西情形而带有报告色彩的信函（1919年春于氏曾写过大量这类报告信），而更应该属于私人往来书信，甚至属于亲属间的家信亦未可知。不过，由于信中写了大量陕西政情、战局方面的内容，则收信者又似乎是关心时局或者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地位的人。

4、人物。残信中提及的人物有17个，然称谓各异：或单言姓氏，或仅称字号，或称全名。这或许多少能反映出于右任和他们关系的亲疏，交往程度的深浅，及于先生对他们的军政行为所取之态度。现按信中文字顺序，分别详略，试加考订、说明如下：

（1）郭。指郭坚（1889—1921），原名振军，辛亥革命时改名“坚”，以喻其志，字方刚，陕西省蒲城县平路庙乡郭家村人。出身农家，少时读书即接触反清思想，性豪爽而胆识过人，曾广交地方刀客与会党人物。辛亥年与其盟弟澄城人耿直响应西安起义，领数百健儿光复同州，号其部为“冯翊军”，并参加东、西路反击清军之战。共和告成，陕军整编，出任巡缉营营长，隶属于陈树藩之第六混成旅。1914年陆建章入陕，巡缉营遭遣散，他转作陈树藩之马弁。后参与反袁逐陆有功，任陕西警备军统领，渐与陈树藩疏远且矛盾日深。1917年底，郭与耿直、高峻分别在西安、白水起兵反陈，组建陕西靖国军司令部。次年，张义安、胡景翼、曹世英等纷纷起兵，建立护法反陈的陕西靖国军左右两翼军。同年8月，于右任回陕统一整编了靖国军各部，郭坚为第一路军司令。

（2）樊。即樊钟秀（1885—1930），原名铎，字醒民，河南省宝丰县大营村人。早年随乡人逃荒至陕西洛川县，以垦荒稼穡为生。清末民初为抗拒土匪而聚众自卫，民间视为“公道大王”。后参加反袁逐陆之役，被陈树藩收编。1918年春，靖国军围攻西安时，陈树藩调其增援。受张义安等民党人士的大义感召，他遂倒戈反陈。靖国军整编时，出任第二路司令。

（3）阎纶如。在郭、樊两路军中，具备向于右任写信资格而姓阎的官长、幕僚中，只有第二路军副司令阎锡民和该路司令部军需处长阎秀峰二人。“纶如”显然出自《礼记·缙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紵”。从名与字相关联的角度推测，或当指阎锡民，但由于笔者掌握史料有限，一时尚难以断定，只好俟诸来日。

（4）马凌父。“父”字为原函写法，公布者均写作“甫”，两字固然可通用，但似乎还是照原件去写较妥。马氏原名步云，凌甫系其字，后以字行，陕西合阳县人。1902年入同州府学为诸生，后肄业于洽阳学堂（即原古莘书院），1904年考入省城关中大学堂，次年官派公费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光复及民初反袁、护法诸役，多曾参与。1918年初，与王一山、焦子静、刘廷森、班翔等人自上海归陕，被郭坚任命为自己的参谋长。

（5）田华堂。时任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部的书记长，为第一路军机关报《捷音日报》（社址在凤翔县城东大街）主要撰稿人之一。1920年续编靖国军第七路（司令为王珏）时，他改任第七路第一支队司令。

(6)党晴颿。“颿”为“帆”之繁体。其人即党晴梵，本名党颿。早年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时，为于右任的学生，后曾在大荔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任总部秘书。1918年10月13日(重阳节)被派至乾县犒军，郭坚留其担任第一路军司令部秘书长并兼《捷音日报》社长。

(7)暴质夫。据马凌甫和张钊回忆，1919年2月17或18日，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钊率卫队及随从人员，在岐山周公庙附近遭奉军截击，张钊等入山绕道回到三原。但张钊的四弟张铮(小秋)被击毙，参议刘承烈和幕僚暴彬被俘。据说，正在与一、二路靖国军商议和平收编事宜的奉军司令许兰洲，“接见了刘、暴，知道他们是靖国军的要人，便延为上宾，并且表示他赞成靖国军的主张，愿意停战言和。将暴彬放回三原，留下刘承烈作他的顾问。”^{[1] 547}《论语·雍也》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此观之，暴质夫或许即指此处的暴彬，但尚不敢遽断。

(8)许。即许兰洲(1872—?)，字芝田，河北省南宫县(今南宫市)人。毕业于湖南陆军学堂。早年投军，积功而渐得升迁。1907年随徐世昌到奉天，后随张勋至黑龙江，任巡防营第二路统领。1912年9月，改任旅长，1914年9月，升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1916年4月中旬，张作霖取代段芝贵担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7月初改为奉天督军兼省长)，遂进一步扩张而图谋兼并吉林、黑龙江两省。此前，许以武力排挤走了本省将军兼巡按使朱庆澜，这时又逼使督军毕桂芳辞职回京(1917年6月)。毕走后，许兰洲通电就督军兼省长职，却引起黑龙江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和步兵第二旅旅长巴英额的反对。1917年8月，经段祺瑞与张作霖的保荐和首肯，北洋政府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并将许兰洲部骑步兵8营调归张作霖管辖，迫使许投靠张作霖。次年9月，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又设谋夺取了吉林地盘，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许兰洲染指黑龙江军政大权的图谋失败后，以张作霖部属身份参与了1918年的奉军援湘之役，曾任援湘奉军第二路副司令，进驻湖北宜昌。湘战停歇后，他率其第七旅“转进潼关，嗣即入陕，帮助陕督陈树藩攻靖国军于右任、郭坚、樊醒民等部。此即所谓奉军援陕之役。”^{[1] 159}

(9)陈。即陈树藩(1885—1949)，字伯(颿)生，陕西安康人。1916年5月至1921年8月控制陕西政权，为陕西靖国军最直接之打击目标。

(10)刘。即刘镇华(1883—1955)，字雪亚，河南省巩县神堤村人。1918年3月，刘率其“镇嵩军”入陕助陈树藩，任陕西省长。

(11)伯英。即张钊(1886—1966)，字伯英，号友石，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人。清末随父来陕，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曾参与辛亥西安举义，任东路征讨大都督，率部在豫陕边境抵抗清军。陕军整编时，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期间，曾奉令带兵入川，旋任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入陕后，遭排挤而被免职调京。陕西靖国军兴，他应邀回陕，任靖国军副总司令。因乡谊关系，他常率随从人员与第二路樊钟秀部一同行动。

(12)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

(13)龙门。即李述膺，字龙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人。清末为耀州廪生，1905年由陕西高等大学堂被选赴日本官费留学，曾参与《夏声》杂志的创办及撰稿事务。袁世凯掌权时，曾任参议院议员。1919年春南北议和时，为上海和会南方分代表，与于右任关系甚密。

(14)衡玉。即张瑞玠(1872—1927)，字衡玉，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人。清末以进士出身，在陕西历任韩城、兴平、临潼、咸宁知县，因“不避权贵，敢作敢为”而“号称清末良吏第一”，并“为陕西布政使樊增祥、钱能训等所赏识。”^{[1] 422}同时又结交郭希仁等士界名流，“誉言噪一时。”^{[1] 421}他亦曾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的西安举义活动，出长铨叙局。民元辞归太原，任山西财政司司长，后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1917年8月，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后返京为钱能训内阁之政事堂顾问。1919年2月上海和会开幕之初，即决定派他来陕西查明双方是否停战，并“监视划界”。张受命后却迟迟京华，入陕后竭力袒护陈树藩。并与于右任就陕战是否停息、靖国军是匪非匪问题，函电交驰，大打笔墨官司。

(15)柏仁。即成柏仁(1889—1958)，陕西耀县人。清末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西安起义后，他加入秦陇复汉军，与清军战于潼关，后任职于大都督府教育司。共和告成，考入上海同济医工大学，1915年肄业。回陕后，在西安省立一中任国文、历史教员。靖国军兴起，他任总司令部参议，是靖国军第三路参议于鹤九所创办之《战事日刊》报的重要执笔者之一。

(16)伯麟。当指姚鑫振，字伯麟，陕西三原人。清末入三原宏道大学堂，为廪生。早年与于右任结交，于

氏所写讥刺时政与当局者的诗稿，即由他和涇阳人孟益民帮助，于1903年印成《半哭半笑楼诗草》。1905年，他被选派官费留学日本，亦为《夏声》主要撰述人员。靖国军时期，他以总司令部幕僚之身，常为《战事日刊》写稿，与姚养吾、李椿堂、于鹤九等文人交往较密。

(17)警吾。其人不详。陕西靖国军兴起之前，在西安聚集了乐群学社的于鹤九、张警吾、高又明、杨子廉、周品如等一批民党人士，后遭陈树藩猜忌而被拆散。^{[1]456}于函之警吾，或许指此张警吾，但未敢确断。

三

于氏残函述及陕西靖国军的不少重要史事，如第一、二路郭坚、樊钟秀部借“联许倒陈”之名，与奉军议和并被收编之事；上海和会及张瑞玠来陕划界事；郭坚部属王珏、郭英甫坚守乾县事等，这些多已为众所周知。除此而外，尚有若干不受人重视或多被忽略之侧面细节，值得细加寻绎和推究。

其一，“郭、樊事今已了然”。1919年初春，陈树藩的省军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援陕奉军许兰洲部、甘军陆洪涛部东西夹击，将靖国军一、二路郭坚、樊钟秀及援陕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围困在乾县、岐山、凤翔弹丸之地。后叶荃与樊钟秀发生内讧，遂愤而率部东去，暂住于耀州。郭、樊两部遭数倍之敌四面合围，“战不足于致果，守不足于扼要，退则南北均无出路，而外援全无，弹药已尽。”^{[1]242}经郭、樊与张钊商议，借“联许倒陈”之名，于2月15日派党晴梵与许兰洲接洽于扶风，形成所谓局部议和。后双方达成协议和三条件，樊、郭两路被收编为奉军第一、二支队。至于右任写此信时，“郭坚、樊钟秀已高悬奉旗，投归许旅矣。”^{[1]387}于氏谓“今已了然”，自属写实之笔。可值得注意的是，象郭、樊那样未经总司令批准即与敌议和、受敌收编，已形同临阵倒戈的叛逆之举，于氏竟无一词谴责训斥。实则，陕西靖国军虽有总司令部，却以一书生领兵，各路豪帅向来我行我素，总司令部徒具躯壳，毫无节制之力。于氏就算骂他个山倾河壅，又有何用？淡淡的“了然”二字，不代表着于先生心无愤懑，只能说出之于无奈。

其二，“日在瓮中说话”。后人论靖国军失败之因，往往注意到各路领兵将领的种种缺陷，如政治意识淡薄，不知“护法”为何物，军纪败坏而扰民过甚，自行其是，不遵号令且“军阀积虐甚深，互争雄长竞保实力，罔识大体，不顾全局”等等。^{[1]468}虽也提及文人的影响，却笼统含糊地称军人“在少数文人的怂恿帮助下”接受改编，^{[1]524—525}“有少数政客唱出‘假途直军’、‘曲线革命’的论调，”^{[1]506}或“有一些谋士、说客奔走于保定、洛阳、西安、三原之间，谋求出路”云云。^{[1]506}在笔者看来，不少人有意无意淡化或轻视了那些政客、幕僚、文人策士的破坏作用。于右任所痛斥的那些“日在瓮中说话，被人活埋还不自知”者，如残函中的阎、马、田、党、暴之流（此类人在靖国军后期更多，恕不例举其名），自与郭、樊辈豪帅不同。他们有更高的文化素养，行事时有更丰富的“理论”指导，也就更能设计、编造出极易蛊惑人心的说辞。靖国军之败，领兵豪帅自不能辞其咎，而这类人可谓煽其风而速其祸，为患之烈早当引起史家的关注。

其三，许某“来陕觅地盘”和“为张作霖开一殖民地”。许兰洲在黑龙江先逐朱庆澜，后驱毕桂芳，其意全在督军席位。既然在关外斗不过张作霖，此番入陕，他焉能不存收之桑榆之想？当奉军初至潼关时，即曾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援陕”议案，宣称“入关后，对敌人应宣布剿抚兼施之主义……行各个击破之策。”并谓：“我军入关俨同异国行军，”“本军入陕，非但匪党疾忌，而匪党之外更有疾忌，”要求“本军如与秦军接触，须格外注意以防意外之变，”“各部队官兵，总以少与秦军往来为宜。”而军行所至，“对于收服人心一层，万不可忽。”^{[1]391—393}如此战战兢兢、深拒严防，如此处心积虑、沽名钓誉，全是第三次督军梦在作祟。职是之故，许氏不仅挟靖国军以自重，慷慨收编郭、樊，且企图令整个靖国军为己所用，因此才有他做督军，请于右任作省长、张钊担任军务会办的梦呓。显然，靖国军时代的陕局，其内幕云谲波诡，正如陈树藩所言：“谋陕者固多。”^{[1]493}然以许氏之昏愤颠顶，肆行破坏、乘火打劫或有一日之长，即使攫得陕西地盘，亦终不过“为张作霖开一殖民地”耳！

其四，“我岂自私自利者哉。”虽阎、马诸人夸耀许兰洲为人如何好，许亦向于右任大伸橄榄枝，但于总司令的态度若何，却不能不加辨析。于右任初回陕西登坛命将之时，陈树藩即曾托郭希仁等名流甘言诱惑于氏。于的回答是：“弟此时但知有国家、有人民，不知有伯生。”^{[1]294}此际郭、樊易帜受编，于对所谓“扶许倒陈刘”主义嗤之以鼻，称之“被人活埋还不自知。”以后，直皖大战段祺瑞垮台，陈树藩冰山倾倒，行将灭顶。他竟异想天开地借“陕人治陕”和地方自治的口号，一方面放胡景翼回渭北收束靖国军，一方面让党仲昭致于右任一长函，请于氏明察“双方久持，终将两败”之危局，幻想着陕人“融合内部，一心对外”，^{[3]91}实则“志在保全生

命财产。”^[4] 而于右任则通电声明,绝不与陈树藩“合作”,“为国为乡为人格,均不能与之握手。不除此獠,万难息兵。”^[5]

1921年秋,胡景翼、曹世英等接受直系改编,孙中山致函邓宝珊称:“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血战历年,苦心孤诣,中外共仰。乃闻立生忽受奸人蒙蔽,召集少数无赖之徒,托名国民大会,变更靖国军名义。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在斥胡的同时,孙中山则赞扬“于总司令及靖国军各统兵长官,咸明大义,誓不附和,为之欣慰。”^[6] 于右任对胡景翼的做法,只能“以大义责之”,^[7] 却别无他法。在致段遂生函中,于氏痛苦地说:“我现在事业已失败,昔年回陕整理陕西的志愿,此刻已陷在万难的地步,出关对不起人,并对不起良心,在陕又无一片地自容,真是难言。”^[3] 当时,陕督冯玉祥曾派胡景翼的参谋长林开甲“到三原向于探问口气,于当然拒绝投降,劝亦无效。”^[1] 掌握北京政府的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8]

1922年春,冯玉祥率部离陕去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遂由刘镇华以省长兼署督军。刘也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靖国军残部,便派马凌甫和景志傅为代表,“赴凤翔请于右任进省,共商陕局”,^[1] 于照例予以拒绝。

纵观整个靖国军时期,于右任持守护法、靖国宗旨,一贯不与北廷“合作”,无论陈树藩、许兰洲,还是冯玉祥、刘镇华,无一不碰壁而还,真可谓志坚金石,态度磊落,本不待烦言。可是,流传至今的不少史料和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却另有异词。早在1921年10月冯玉祥致北廷鱼电中,便有“我军入陕,陈树藩败退后,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总指挥胡景翼等迭派代表到省,表示服从,愿受编制”之言,^[1] 冯受某些“受编派”之欺蒙而作此语,尚可理解。可怪者,刘允臣先生在其1936年的日记中,仍谓当年“彭仲翔、王普涵为于右任代表,私与曹锟、吴佩孚勾结,以敌陈树藩。陈附皖系首领段祺瑞,于亲直系首领曹、吴,盖欲以北洋派制北洋派也,要与党义未能尽合。故直系入关之阎相文,实为于迎”。^[9] 解放后,马凌甫、张钫写的回忆录中,一个说郭、樊受编后不久,“于右任也派他的军务处长彭世安(仲翔)到兴平与许兰洲通款曲”;^[1] 一个说郭、樊“征得于右任和我的同意,均暂编入许师,借资整补”。^[1] 对此,只要稍微考究一下刘、马、张当年同意或力主议和受编的言行,我们便不难理解个中三昧。总之,厚加给于先生之诬词猥言,并不能丝毫玷污先生清白之誉,因为先生本非“自私自利者”也。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歪曲与篡改。

其五,“这种事电去,和会岂不破了”。上海和会自1919年2月20日开幕,至5月14日双方代表辞职,始则纠缠于陕西停战问题,继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患病入院,未则因争执国会问题而止。其中陕战问题影响尤大,诚如王占元等一些北洋系将领所说:“中国之安危,系于和议;和议之成否,系于陕事。是陕事虽小,而所关固甚大也”。^[1] 当张瑞玑被公推为入陕划界专员时,于右任等以其旧属党人,而靖国军又战情日恶,不免对张氏寄望甚殷。孰料,张氏先是缓缓出京,入陕境后却不由临、渭渡河以勘清防线,竟自入省与陈树藩昏饮周旋。于右任残函所说:“陕战未停情形,已函衡玉,伊接函后淡然。柏仁请伊电海上……遂草草入省”。证以其它史料可知,张瑞玑入境到渭南时,于右任曾派成柏仁持自己亲笔函前往见张,将陕西战事并未停止情形作了介绍,张氏态度竟是“淡然”,成柏仁请其以实情电告上海和会,张却谓如此和会“岂不破了”。此情节颇堪注意者有三:一是于右任主动与张联络,意在让张氏助己方;二是张氏深惧和会破裂的心态暴露无遗;三是既然电去和会即破,隐含的信息便是,张氏恐怕在内心深处也承认陕西尚处于战争状态。

张瑞玑于3月22日进入西安,次日却发出“梗电”谓:“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3月25日再发“有电”云:“战事既停,和会即当续开”;并称自己此行当以“实行息战安民为第一”宗旨。26日,为与双方接洽停战、划界事,张离省去兴平,先与许兰洲会晤。接着转赴三原,会见于右任等,并在三原小住两日,于4月1日返回西安。按理,张氏走了一圈,当知战端未停。他自己也称,乾县等处战事在兴平已有耳闻。在三原,他又亲见了王珏、郭英甫的告急帛书。故在29日、30日、31日,连电陈树藩等,要求省军“解围”、“退步”、“停攻”。可一旦回省,张之态度即迥异于在外之时,故被于右任指责为“隐战祸以赚和会”,“举人与地,分赠陈、许”,“划界不划,监视不视,退兵不退,通报不通,专以空言诳我,是直为一二人开生路,为八百万人民延战祸也”。^[10] 其实,在笔者看来,张氏态度如此矛盾,处置如斯倒错,陈树藩的拉拢利诱当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则是其心态失衡所致。张既有为陕民求和平的“崇高使命感”,又深存和会破裂之恐惧心理,既殷盼和会续开,又无法摆脱陕战事实的困扰,政治需求与良心本能阴阳错位、交互煎熬,使其神智迹近乎昏乱,遂不免要颠倒黑白而指鹿为马了。

陕西靖国军是民初北方地区唯一的大规模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军政力量。自1917年底和翌年初崛起,到1922年夏杨虎城部退居陕北止,靖国军血战四载有余,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败因,固属良多,主、客观诸多因素的扭结,时、事、势的错杂变异,都对靖国军的结局起了“合力”作用。

不过,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对靖国军最主要、最关键的败因,认识上则不尽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各路将领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意识均较淡薄”,^{[11] 187}在形势变化后又未提出新的行动方针,“多数人已感到前途茫茫”,^{[1] 506}“各将领都有保存自己力量的心理”,^{[3] 20}遂借“假途直军”、“曲线革命”的论调卷起了靖国大旗。另一种看法则强调靖国军“苦战五年,民力不继”,因财税枯竭、“军饷无着”而导致被迫受编。最典型的证据,是1921年秋胡景翼在三原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时,胡登台讲话称:“景翼是个军人,并不怕打仗,只因军费无着,才受别人的改编,如果各位能想出办法筹措军费,景翼绝不走这一条路”。^{[3] 21-22}

上述看法均有其充分根据,亦能自圆其说,但笔者以为,却没有号准靖国军的命脉,也未能勘透靖国军的本质。谁都知道,陕西靖国军借护法之名而兴。然护法者何?民元约法和国会也。当袁世凯刚死之际,孙中山曾致函黄兴称:“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12] 308}随后,孙通告中华革命党:“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12] 333}可是,继起的黎元洪、段祺瑞倒行逆施,蹂躏国会、践踏约法如履平地,孙中山这才感到“袁氏死后,势力仍在彼党徒之手。民党无权,万事不可为”。乃号召“集合团体”,“推广党势,团结党力”,^{[13] 282}以求“复约法,开国会”。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14]若国会遭解散,约法被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15] 547}由此而有护法运动。然而,约法与国会这两个共和国的象征物,孙中山钟爱的两大法宝,在普通国民的观感和心理上,早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以至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民众“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虽然孙中山利用西南军阀的实力成立了军政府,初期还担任了大元帅,但他有府无军,命令难出府门,最后只得愤而回到上海。而当时的中国,“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6] 132}事实证明,要解决这些政治、民生问题,靠苍白无力的约法与国会显然无济于事。

陕西靖国军崛起时,虽亦托名护法,但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陈树藩种种“祸陕”罪行之愤慨与反抗。约法和国会之命运如何,护法之宗旨、内涵为何,除于右任等个别国民党人物外,全体将官士佐并不知道亦不想知道。靖国军揭橥的大旗和奋斗目标,不过“反段倒陈”四字而已。由于段氏控制着中央政权,正声势熏天,而陕西靖国军仅局限于关中一隅之地,倒陈固然可视为对段氏的间接打击,却毕竟不能直接触动段之权势。因此,陕西靖国军的现实追求,也就只剩下了可怜的“倒陈”二字。靖国军兴,缘于陈氏“祸陕”;靖国军亡,基于直皖战后直系武力驱陈而代之。靖国军苦斗经年,与其说与护法运动相始终,倒不如说与陈树藩“祸陕”相伴。从表面看,“倒陈”是陕西靖国军护法的手段与途径,可就实质言,“倒陈”更是靖国军的唯一政治诉求。在这里,手段与目标不仅相混淆,且发生了明显的错位和倒置。

正因为斤斤于“倒陈”这一狭隘追求,一旦段氏垮台,陈树藩被赶下督军宝座,靖国军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当时靖国军上下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倒陈陈已去,反段段已倒,靖国军的任务已完了”。^{[1] 547-548}既然如此,“通权达变”接受北廷收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局。同理,只要能够“倒陈”,靖国军的豪帅和幕僚们便可以不要手段,牺牲政治信义和人格追求亦在所不惜。郭坚、樊钟秀的联许倒陈,胡景翼、曹世英的联直联奉,均名为联合而实为受编,但都可视为服务于“倒陈”这一有限目标。陕西靖国军的结局最令人扼腕叹息者,不在于其失败,而在于其失败的方式。军人效命沙场,马革裹尸。死者,其分也。靖国军若力战玉碎,其败倒也轰轰烈烈,然在实力犹存之时,竟受北廷之编,可谓不败于疆场而败于密室。数年之间,靖国军虽也有张义安、董振五、井勿幕那样舍生取义的铮铮铁汉,但绝大多数人往往临难无节烈之气,遇危有苟且之心。凡此种种,均与“倒陈”这一目标息息相关。一言以蔽之,陕西靖国军本托名护法,然就全国大局言,法早已不足护;就陕局论,亦无护法之实。其兴其亡,均可以“倒陈”二字释之。

[参考文献]

[1] 中共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靖国军[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2] 荆有岩. 奉系军事集团的形成与扩展[A]. 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 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 [3]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陕西文史资料(第 16 辑)[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4] 岳维峻致李龙门电[N]. 北京晨报, 1920—09—04.
- [5] 于右任张钫胡景翼曹世英岳维峻高峻王珏郭英甫铣电[N]. 北京晨报, 1920—11—27.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于右任. 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墓志铭[A]. 李凤权. 胡景翼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8] 冯玉祥. 我的生活(下册)[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9] 于(右任)章(太炎)旧嫌——摘自刘允臣先生日记[A].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西安文史资料(第六辑)[Z].
- [10] 于右任张钫电话张衡玉(瑞玑)[N]. 北京晨报, 1919—04—19.
- [11] 王建军. 汪春劼. 陕西靖国军史[M]. 香港: 银河出版社, 2001.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4] 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N]. 民国日报, 1916—05—06.
- [15] 复头山满犬养毅述护法目的书(1918年3月28日)[A].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国父全集(第三册)[M]. 台北: 党史会印行, 1973.

[责任编辑 李玉英]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Yu Youren's Letter

——An Analysis on the Main Reason for Failure of the Shaanxi Jingguo Army

LIU Dong-she

(Humanism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On March 24, 1919, Yu Youren wrote a letter. This letter w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because it involved for 17 historical personages and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such as Guo and Fan's troops were reorganized, Xu Lanzhou's plot to seize Shaanxi power, Yu Youren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Northern Warlords, Wang Jue and Guo Yingfu's defensive war of Qianxian, Zhang Ruiji delimited a boundary of the Jingguo Army's area and the provincial Army's area, etc.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ends and means of the Shaanxi Jingguo Army were both toppled Chen Shufan. So,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rise of the Jingguo Army was in the name of the Hu-Fa Movement, its fall based upon in name but not in reality and the Hu-Fa Movement were of no avail.

Key words: Yu Youren; the Shaanxi Jingguo Army; ally with Xu to against Chen; the Hu-Fa Movement